

[“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会议论文小辑]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李兴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首先概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的重要性和今后继续坚持中国化大方向的必要性, 然后提出了与此有关的六个自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并大概列举了一些自己的初步见解, 以与各位新老朋友共同讨论。

关键词: 伊斯兰教; 中国化; 理论问题

10. 16023/j. cnki. cn64 - 1016/c. 2018. 01. 001

中图分类号: B9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0586(2018)01 - 0005 - 06

伊斯兰教中国化, 是贯穿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一条红线, 也是观察和认识中国伊斯兰教形态、轮廓、特色、走向的一把钥匙, 更是我们今天在新的中国和世界条件下定位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标尺, 无疑也仍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引导中国伊斯兰教继续前进的唯一正确方向。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对伊斯兰教历史、理论、现状的一轮辛勤的研究, 已基本成为教界、学界、政界的一种共识, 这是中国伊斯兰教之福。然在这种已有一定共识的新背景下, 大家又愈来愈感觉到过去的研究虽成果可喜, 成就可赞, 但用中国化这条红线衡量, 不免仍是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空白, 并不尽人意。这样就将上一个台阶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摆置在了年轻朋友们的肩上。然要能在一个新的水准上研究中国伊斯兰教, 对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的理论认识深度, 就成为了下一轮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能否真正上一个台阶的关键。基于此, 笔者先抛砖引玉提出几个自己认为是问题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问题, 与各位新老朋友一起探讨。

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前期或生成机制问题

这个问题说白一些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为什么会从一开始就较顺畅地、平稳地、持续一贯地、自然而然地坚持中国化的走向, 并很自发地将此作为自己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成的一个传统, 这其中的奥秘到底在哪里。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主流“中道”在中国条件下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合”传统的相契合, 并彼此互动所致。这如果细化一些说就是以下五点。

1. 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和核心价值观“中道”与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开放包容传统分别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或者说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 2017 - 11 - 25

作者简介: 李兴华(1938—), 男, 河北内丘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伊斯兰教研究。

2. 伊斯兰教的“中道”主张与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主张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一个以双方心心相通、核心价值观相对接为特色且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机制。

3. 两者都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原动力,这种原动力的提供包括吸引力、凝聚力、驱动力、可持续力等多类型且可以体现在精神、意识、思维方式多个不同领域的文化力。

4.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特别是传入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的和平方式,借助于外交、外贸、求学等间接方式以及有穆罕默德亲口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训示,与传入地所采取的开放包容,尤为两者在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对接提供了很有利的氛围,并大大减少了可能遇到的一些外在阻力。

5. 两者在中国环境下的对接、契合和互动,既是一种量变,也是一种质变;既是一种原初文化生态的位移,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的新生。从不同的角度看,它起码从文化形态上有四种联系,也有区别的特点。一是从单纯的文化力的角度看,两者结合文化力仍然是原初的那种,有一定的吸引力、凝聚力、驱动力的文化力,只不过从量上有了很大的补充,发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文化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既可以说是伊斯兰教原有的合和之道在异地的一种发挥,也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中道效应在本地的进一步发挥,两者是等价的,互换的;既可以说是伊斯兰教的中道在起作用,也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起作用。二是从文化机制的角度看,两者对接互动后其机制形态已从单一升华为复合,从原初演变为再生,成为了一种具有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双重特色的新文化机制。三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具有伊斯兰教和中国双重品格的新机制由于生成于中华传统文化正在成熟时期,所以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只不过它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框架的时间要晚于中国化的佛教而已。四是单纯从中国伊斯兰教的角度看,这种伊斯兰教与中国相对接互动为方向的机制,应该说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第一天起就具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优良传统,即最初的、最古老的传统,形象一些说就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根”与“魂”。

至于这种中国伊斯兰教之根之魂具体指什么内容,这是一个大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种以“开放包容”为核心的文化模式,它既是一种精神、意识、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人格、品质、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或历史分期问题

这个问题说白一点就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过程问题,这个过程按中国化的内容、目标或者涉及范围的不同,在自唐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起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千余年中大约经过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唐宋)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启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伊斯兰教中国化仍然是围绕着伊斯兰教同中国人的心、中国人的情(华心)以及中国人生长、生存的土壤(华土)的尝试性对接和初步互动这个主题而展开,其结果虽然尚不是常态或定态,但却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打下了坚实的民心、民意基础,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这也是笔者将唐宋600年视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时期的根据。

第二个时期(成吉思汗西征至明中叶)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初盛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伊斯兰教同中国人的心、中国人的土的对接互动成为了常态、定态,而且两者的深层对接已经开始在伊斯兰教构成的外层和中层多个领域展开。正如笔者在《格底木史初探》一文中所叙述的元至明中叶“大批的穆斯林同中国的地域、经济、居民等的这种结合,从表面上看,好像与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但实际上涉及了这种伊斯兰教的最根本的方面,即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变化首先在穆斯林与汉族接触比较多”,又与“穆斯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领域内展开,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第三个时期(明中叶至清中叶)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兴盛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伊斯兰教在其构成的内层或深层的多个领域即教义、教理以及教派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释道三教进行了大面积、深层次、比较成功的对接契合、融合会通,最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从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两个角度分别来看恰当合度、从具有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双重品格的新角度来看又十分完美的伊斯兰教新存在形式。这一形式既没有失去伊斯兰教的原旨,又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少优势,真可谓是中华传统文化乃至全人类古老文化史上的巧夺天工之作。

第四个时期(清末民国)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寻找新路、力挽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最瞩目的成果就是中国人(包括中国穆斯林、回族精英)找到了一条在中国挽救教育、宗教、民族、国家落后衰败的道路,表现在

中国伊斯兰教领域就是回族精英在教育、宗教、民族、国家四者及其相互关系上的全面觉醒,即不是把这四者的复兴单独提出来进行挽救推动,而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局中将这四者的复兴结合起来考虑推动,这样就有了一个四者同时、共同复兴的大方向。从目标上看,不单独提宗教复兴、民族复兴等等,但从内涵上看却包括有宗教复兴、民族复兴等等的内容和成分。鉴于此,接近于断裂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就得到了接续。

至此,我们算是简单勾画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的一个历史轨迹,但这对人们全面领会和理解这个对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提供重要正能量的文化现象或者文化机制是远远不够的,故还必须作进一步的加色加彩。按笔者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理论和现状的初步研究,现只能再作以下勾画。

1.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一种与佛教中国化有显著不同的文化模式,即虽中国化的大方向相同,但过程的走向,特别是起始的走向却完全相反。具体的说就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过程主要不是从传教开始,从取经、译经、传授教义教理开始,而是从其载体同中国人的心(华心)、中国人生长的土(华土)的尝试性对接开始,即围绕着伊斯兰教载体的初步地域性转化开始,而且遵循着人心相通和本土化两个并行的维度。

2. 伊斯兰教中国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在伊斯兰教构成的外层和中层领域进行,从而在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构成中有比中国化的佛教多得多、深得多的世俗和只带宗教色彩的成分积淀。

3. 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仅有一个民心相通和异地扎根的过程,而且紧接着又有一个同样比较漫长的从伊斯兰教构成的外层、中层逐渐向内层深入的过程,这和佛教的中国化进路也是不同的。

4. 伊斯兰教中国化从唐至新中国成立这1 000多年里虽然基本上是一个“以一贯之”的渐进传统,但也有几次比较显著的部分质变,有几次比较显著的挫折或后退,前者使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自然分成了几个大的历史阶段(时期),后者显示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并不完全直线运行,即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曲折有弯路的,这个曲折和弯路,主要是有外部原因,但内部原因也是有一些的。

5.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其生成机制不断变化的过程,所以在每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化都有不完全相同的生成机制和生成能力,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化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

三、伊斯兰教中国化还在路上

这个问题一方面实际上是下一个问题即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现实定位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又是承上启下、承前启后将本文所涉及的四个问题看作是一个长过程的桥梁,所以在此单独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

说伊斯兰教中国化还在路上主要根据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生成机制及伊斯兰教与中国国情的相通、对接和互动一直到今天仍有较强的生命力,仍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继续存在和前进的唯一正确方向。不过经过1 000多年的一系列量的和部分质的变化,伊斯兰教中国化在内容构成和机制上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具体一些说就是运作方式除了中国化一个主要走向之外,又相对地增加了中国走向世界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向东看的内容,一则使中国化已不再是原有内容构成的中国化,二则使原有的自为、自发、被动或任其自然的机制运作方式迅速地向自觉、主动的机制运行方式转变,从而使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运行渐渐完成了原有的和合、对立两种情形自然发展的状态向人们可以自觉、主动引导的转变,从而使伊斯兰教的正能量得到了尽量发挥,负能量得到了有效的管控和消解。此外伊斯兰世界在长期彷徨犹豫之后也在悄然变化。

这种中国化运行方式转变过程严格的说已从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包括中国穆斯林精英在教育、宗教、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上的全面觉醒时就开始了,但由于三座大山的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制约,中国人民尚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不用说主动引导文化的运行。然而,经过民国时期几十年的浴血奋斗,新中国成立最初30年的站起来,改革开放几十年的逐渐富强起来,中国人已有条件来主动引导中国化的运行,故主动引导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运行就不仅是中国政府的自觉行为,而且也愈来愈成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共识,在这种状态下说“伊斯兰教中国化还在路上”主要是进一步强调中国伊斯兰教“不忘初心”,正像说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运作方式已有重大改变,主要是要强调伊斯兰教中国化现在已开始走上一个新的征程一样。

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现实定位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当下或者当下一个时间段里为引导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现进程确立立脚处或着力

点的问题 这应该是从现状或现实的层面上认识和处理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的一个关键或一个前提。如果现实定位不好或不准,中国化进程的落实即落到实处就是一句空话。

但如何具体进行定位,这就取决于定位对象本身的机理机制,取决于人们曾为引导顺利运行预先设计的目标等等。按笔者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初步研究,对中国伊斯兰教现状的亲自体验,应该采取渐进式多维多层一体综合性定位方法处理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较为合适,这种方法概括一些说可以称为“渐进式多维多层一体综合定位法”,形象一些说则可以称为“渐进式四步定位法”,让我们对这四步作以下勾画。

第一步是在多维度意义上进行定位,即在既与伊斯兰教构成内容有密切关系,又与中国国情实际需要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单一关系领域,即“维度”内进行定位,如在伊斯兰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中的定位,中国穆斯林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者努力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中的定位,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在国家发展、稳定、安全中的定位等等。

第二步是在一些复合关系领域进行定位,如在构建新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定位。按笔者的理解,它应该也必须是这种新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然不仅难以保证这种价值观的圆满,而且也辜负了历史上为伊斯兰教中国化贡献出了自己毕生智慧和力量的众先贤。

第三步是在中华民族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一体的意义上进行定位。由于目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尚处在攻坚阶段,两个一体的对接也还处在初步或尝试阶段,态势尚不明朗,定位也就更有难度。然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则是无疑的。

第四步就是根据初步的实践,回过头来再对原先的定位多维多层一体进行反思,作一定的修正和补充,以使定位进一步完善、精确。

必须说明的是,这四步走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其中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最好是一步一步的进行。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问题从释解问题的路径、角度来看,运用的是“定位先行”路径,故概括起来可以称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现状研究中的“定位先行”路径,这和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研究中采取的“理论先行”或“生成机制先行”路径是不同的。不过不能忘记这种不同是在中国化的机制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大前提下,即大同条件下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在历史研究的范围内,还是在现状研究的范围内,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题和大方向都是一致的,而且仍然可以视作是一个“以一贯之”的过程。

五、伊斯兰教中国化目前运行的优势和短板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上一个问题的进一步引申,侧重点是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现实状况,特别是研究状况的一种整体评价,以便使我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下一步如何继续走、如何进一步走好心中有数。

就当下视角观察,伊斯兰教中国化起码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1. 有长期逐渐积淀和不断夯实起来的坚固和耐久的人心和土壤基础。

2. 伊斯兰教同中国国情的对接,在唐至清后期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采取的都是两者构成的外、中层逐渐向内层深入的渐进式的、符合两者机理的一步一步契合的进路,故契合在深度、坚实度上是其他进路契合难以相比的。

3.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不仅为中国化的伊斯兰教积淀了比佛教中国化多得多、广得多的属宗教构成的外层、中层的内容,而且在宗教构成的内层即经典、教义、教理和核心价值观方面也不比中国化的佛教逊色多少,加上双方长期的心心相通、话语对接、文文相译,其深度是令人赞叹的。

4. 伊斯兰教在明清之际和清末民初的两次较大规模的迅速觉醒,说明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或中国伊斯兰教具有较强的跌倒能爬起来的机制和能力。

5. 伊斯兰与中华两大文明虽然在近代都遭到外来的侵略,都有一个衰落时期,都错过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但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一个逐渐觉醒、争取解放的复兴道路,少走了约百年的像阿拉伯国家那样基本上是曲曲折折,一会儿春,一会儿冬的弯路。

6.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近百年里,虽然有一些曲折,特别是10年文革那样的大曲折,教训惨痛,但也

继续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如抗日战争时期在今宁夏同心县(时称豫海县)取得红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和合为特征的“同心经验”;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取得的治国理政经验;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所创造的将主位与客位、专业与业余、学界与教界政界原来分立、对立的学术研究方式合为一体,协调研究的经验等等。

以上六项优势,如果再加上始终一贯“坚持中道,拒绝极端”的优势,那中国伊斯兰教乃是世界伊斯兰教整体中值得研究、尊重和借鉴的一支,中国伊斯兰教界应该有这个自信。

同时,就当下视角而言,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特别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研究目前还存在一些短板,这是无疑的,初步梳理起码有以下几点。

1. 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还相对明显。特别是在新疆地区或者在维吾尔族等地区,笔者目前对这里的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都还勾画不出一个有明显逻辑顺序的大致轮廓,更不用说与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比较、对接和融为一体了。此外,在回族相对聚集地区与撒拉、东乡、保安等族相对聚集地区之间存在着怎么样的不平衡,笔者也还没有明确的概念。

2. 对唐至明中叶这800余年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容我们揭示得还不够,以至于在《中国伊斯兰教史》撰写完成交付出版时,负责出版的同志则因明中叶至清末部分与其他部分篇幅太不相称,像是一个大肚子,宁让我们将这个“大肚子”削掉几十万字,使好些比较精彩或重要的内容忍痛删去。岂不知就是这“大肚子”的内容与同样时间段的佛教中国化内容相比较,在篇幅容量角度看也还是不相称的。

3. 改革开放以来,在伊斯兰教研究各界同仁的努力下,尽管也汇集出来了一套一套的史料集成,但对其进行研究消化却跟不上,这就好像好不容易生产出了粮食,然食用、消化跟不上,仍然是难以“文化”成人身上的血与肉。

4. 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在中国伊斯兰教内曾被视作是“汉克塔卜”,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各界在这些年对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它或它的最有思想学术性的部分离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承认或公认为“经典”还相差甚远,同样也还是“文化”得不到家。

5. 至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各界研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激情或热度,显然在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开过一轮后有所下降。在五省区讨论会,包括启动五省区会议的乌鲁木齐南山会议上各路研究豪杰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那种各路英雄齐聚“南山”论剑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浮现在笔者的脑海里,激励笔者即使在病危时仍不时思考着一些自己认为是紧迫的问题。

6. 此外资金、人才投入不足,领导重视程度不如改革开放初期那黄金十年,也应视为一个短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国家制定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时,确定的24个宗教学科基金资助项目就有伊斯兰教类项目五项,而且起步很晚,研究基础薄弱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也和《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国基督教史》一道被列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在宗教学领域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对待,仅有八九人的伊斯兰教研究室就派四人参加,还不说时任所长、室主任亲自指导着前期的立项、撰写工作。

六、伊斯兰教中国化外部环境在当下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和如何应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同样密切关系着伊斯兰教中国化宗教自身和宗教研究两轮的运行,处理得好,运行就会理想、顺畅,处理得不好,运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伊斯兰教中国化外部环境在当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个“变”字,这是中国人处理国内外各种问题时都会遇到的,认识和处理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也不会例外。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应对这个“变”字呢?笔者暂时用下面四句话作一初步概括。

1. 完成四项重要转变。第一在思维方式上完成从零和思维向和合思维的转变;第二在理解中国化含义时完成从单纯中国化角度向复合中国化角度,既包含中国化也同时向世界化的转变;第三在对中国化进程运作方式的理解上完成从任其自然进行向主动加以引导的转变;第四在理解和定义中国伊斯兰教载体上完成从纯粹的宗教载体向同时也更是主动引导宗教在中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主人翁”的转变。

2. “以不变应万变”。即不忘初心,坚持和发扬核心价值观、坚持自信、坚持底线等等中国特有的看家本领。

3. 对症下药应变。即用不同药方应对快变、多变、大变、突变、连环变种之不同形态的变。如用求同存异、管控分歧等较为灵活变通的方式应对包括对抗因素或者有较大差异但并不是无解的变项,用重预测、重预警、做预案、抓苗头、观风向、看走势、察舆情、察言观色等较为不显眼的方法应对某种有迹象,但还远未成为问题的变项。

4. 多方协商合作共同应对。特别是围绕着伊斯兰极端问题的一些应对,应对解决穆斯林贫困问题的一些策略。

以上四句话或四段文字的概括,如果再扼要一些就是灵活应对、变通应对或智慧应对,即超越一般知识应对、理性应对的一种创造型应对(智库应对)。

以上主要陈述了笔者对这六个问题的初步见解。不过还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一是这六个问题并不是伊斯兰教中国化主要理论问题的全部,尚有一些研究界没有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如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问题、内地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儒化和化儒问题、内地伊斯兰教研究中的“溯源”问题等等没有涉及。二是涉及这六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将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连成一体,一以贯之并尽量贯彻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

Several Theoretical Questions about the Sinicization of Islam

LI Xing-hua

(World Religion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author first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Islam and the necessity for adhering to the orientation of sinicization. Then six questions are raised and some tentative opinions about this issue are given for discussing with new and old friends.

Key words: Islam; Sinicization; Theoretical Questions

责任编辑:李 华